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条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路^{* 1}

刘林元

摘要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推进,并且俄国革命的经验也是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问题上并未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经验”,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路,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当前历史条件下,重温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新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主义; 非暴力革命; 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11-0031-07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7.11.005

作者简介 刘林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导 南京 210044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在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部署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示范,达到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是一致的^①,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和苏联经验,没有采用暴力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另辟蹊径,通过和平改造的途径,和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取得了成功。这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俄国经验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明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暴力夺取政权(恩格斯1895年3月6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里有新的说法,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陈旧了,无产阶级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开始被采用,并迅速获取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②)。第二步利用政权力量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了防止资产阶级的反抗,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都必须使用暴力。恩格斯在临终前虽然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可以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主要问题研究”(10AZD001)的阶段性成果。

改变,不举行起义而靠选举和平夺取政权,但这个思想只是一闪而已。后来伯恩斯坦、考茨基接过恩格斯这一说法加以渲染,被共产国际公认是修正主义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

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的思想指导,首先以列宁格勒的海军暴动,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权,然后由城市推向农村,在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武装干涉对抗之际,建立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然后依靠政权的力量用暴力消灭城市的资产阶级,剥夺他们的财产,消灭农村的富农,或者关进监狱,或者驱逐出境,甚至加以肉体消灭。总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实现夺取政权和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两大历史任务,是执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又指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举行,坚持“同时胜利论”;而列宁在经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俄国领导革命,实行“一国胜利论”,遭到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讥讽和反对,说列宁没有耐心等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不及待地在一国举行起义,这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指示的。

二、中国共产党“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非暴力革命的新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俄国实践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目标相同,都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都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包括夺取政权这一步,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夺取了政权。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就表现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方式上。

照理说,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学习俄国经验,搬用列宁斯大林的做法。但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做,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另辟一条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路。诚然,中国共

产党已经大权在握,但中国共产党没有用政权力量强迫资产阶级交出他们的工厂,强迫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而是用宣传教育、示范引导,帮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用的是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手段。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是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前进,由互助组到合作社走上合作化道路,主要是正面宣传、典型示范,由农民自愿参加(不排除有强迫命令存在)。因为是和平的自愿的,所以没有出现像苏联当年合作化过程中出现农民集体反抗和破坏性行为。政权的作用体现在宣传、组织、示范上,体现在帮助解决合作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上。比如,培训合作社即制定合作社章程,推广先进经验。毛泽东和党中央相信,民主革命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实行土地改革,使他们翻身解放。广大农民会从自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只有走合作化道路才会实现第二次翻身。他们信任党的领导,相信党领导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应当充分相信:党完全可以把广大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来,农民是我们最基本的群众。民主革命中,广大贫苦农民就坚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相信他们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也会坚定站在党这边,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党对农民的关心和教育、农民对党的信任和拥护,正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这是建国后党同广大农民关系的一个特点。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定地要引导广大农民走上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农民自愿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过两个“一分为二”的分析。第一个“一分为二”就是把资产阶级分成大资产阶级(也叫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即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因其依附于帝国主义,与革命为敌,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革命对象,已被消灭。建国以后的所谓资产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第二个“一分为二”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民族资产阶级

因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压,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又害怕工农起来革命,所以它的革命是不坚决的,具有软弱性。民族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时,由于它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加之“左倾”领导的错误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贯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调整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成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一分子,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起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建国以后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民族资产阶级是合法的保护对象,他们的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扶持,他们的代表人士有的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工作。而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有过长时期的合作,支持过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愿意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欧美的资产阶级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因其政治态度,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作为剥削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但作为人民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具有对抗性的一面,但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可以用非对抗性的方法来处理。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认识前提,是中国和平地非暴力地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认识基础。

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是和平的,不是急风暴雨的暴力革命。这场革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作出了新的创造的结果。在指导思想明确几点:一是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原理即精神实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改造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最为有利、有效。在政策措施上,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

义改造的前提下,尽可能考虑资本家的实际情况,调动他们参加“改造”的积极性。一是对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改造,从加工订货的低级阶段一步一步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为国营)的高级阶段逐步发展升级,不是一步到位的,这便于总结经验,以利于稳步妥善进行改造。二是把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同时要把资本家和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三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使资本家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补偿,这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资本家的思想改造。由于党的和平改造资本主义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得到了资产阶级代表人士的响应和配合,原来计划要在一个“相当长”(即15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任务,结果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1953年到1956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顺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程是和平的、顺利的、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创新,对顺利推进和平改造起了重要作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无产阶级走暴力夺取政权后,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为防止和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依循了上述思想。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限制,对资产阶级进行暴力制裁。专政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对象是资产阶级,手段是暴力。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实行的对资产阶级“继续革命”措施。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要不要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没有说到。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公开宣布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过去的理解是,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理所当然。仔细想来不尽如此。一个国家要巩固政权,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总要实行某种专政。在我们国家,资产阶级中的大资产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已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不是专政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是人民(国家政权代表),对象是一切反国家反社会反人民的违法犯罪分子,手段是依法治罪。所以,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强调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避免了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专政对象的错误发生,大大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我们过去也说过,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为了照顾到马列的提法,实际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

三、六十年后的再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党内外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按照毛泽东原来的想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他承诺过这个实践要有15年的时间;但他后来又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独立于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与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独立存在的社会形态,而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③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思想开始并没有为刘少奇、周恩来所了解所理解。刘少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时间在15年到20年左右,这段时期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要保护要发展,发展到一定时间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与毛泽东的思想存在不一致。毛泽东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过渡时期,巩固和确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做法是不对的。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就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全党在认识上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上,在195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统一了党的领导层的认识和行动,但在全党并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特别是“三大改造”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以后,这种认识分歧又抬头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确认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改革的出发点和总依据,对当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内容又进行了改革,比如搞联产责任制、分田到户,允许和鼓励私有经济的一定发展,似乎又要回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人们对“三大改造”提出的问题更多也更加尖锐,“与其现在,何必当初”,一股怀疑、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潮在不少人心头涌起。因此,六十年后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加以重新认识,是有必要的。

这里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有没有公开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观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革命先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④1945年党的七大又强调了中国经历一个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必要性和发展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直到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还就新民主主义各种成分的经济结构做了分析。这说明毛泽东关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是明确的。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阶段公开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为了统战的需要,诱使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站到共产党一边来,支持中共把革命进行到底;一旦革命胜利了,政权到手了,他就不再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事。这些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欺骗,是钓鱼。这种观点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欺骗,是虚晃一枪,为什么建国初期刘少奇、周恩来还要为确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努力,难道对刘少奇、周恩来也欺骗了?如果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真知道毛泽东只是为了某种目的的说法而已,并不会真心实行自己的承诺,他们还会坚持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有意与毛泽东作对吗?实际上不是毛泽东的钓鱼和欺骗,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不再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还要巩固一个历史时期,而支持

建国后就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但他的认识变化并没有及时与刘少奇等人沟通,以致他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上出现了不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呢?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土地改革后农村的两极分化问题严重。解放后,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土地改革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但经济上并没有真正翻身。毛泽东认为,避免农村发生贫富对立的两极分化,只能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才能实现。所以,建国后他是积极支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关于提前改造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主观上是毛泽东在理论上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统一起来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看来,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扩大,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了,过渡时期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中止了。所以过渡时期不是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是不断地增长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没有为刘少奇等人所理解,他们认为(也应该是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应该搞15-20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用15-20年的时间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解不一样,根据刘少奇的观点,毛泽东是提前搞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看来建国后搞社会主义改造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应有之义。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统一起来的想法看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因为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在战争年代都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认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在建国后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观原因。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是毛泽东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外部原因。我们知道,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对中共是有过真

诚帮助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新生政权的承认和大量援助,使得在外交上“一边倒”是合乎逻辑的。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自觉选择。那种认为毛泽东是害怕被扣上和铁托一样的民族主义帽子而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说法,就毛泽东本人的性格而言是不可信的。国内的原因来自资本家方面的问题。通过“三反”“五反”暴露资本家的许多不法行为,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研究毛泽东当年为什么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时,他的心理因素和性格原因,也是应该考虑到的。毛泽东性格比较急,迫切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让他再等待几十年(15年新民主主义加15年过渡时期)让国内资本主义有一个大发展,再来搞社会主义,他能忍受吗?至于生产力落后,为什么不能像列宁那样先进入社会主义再发展生产力呢?毛泽东的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对他决策解决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会产生影响的。^⑤

第三个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是不是要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党内外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就是对当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就是要重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种观点绝不能苟同。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肯定它,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主要是肯定它的方向正确,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再就是它用和平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条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正确的。从效果看,没有产生大的社会震荡(这是社会革命通常会发生的),生产力没有遭到破坏,推动了社会的前进。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条和平地非暴力地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对全世界是有积极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和敌对的情绪。但应该承认“三大改造”是有缺陷的,不是十全十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

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太快、社会主义成分要求太纯,有点“一刀切”简单化的做法。加之后来(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做法之争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准对“改造”的后遗症加以补救、完善,使存在问题及其终极影响扩大了,影响到经济和人民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确认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肯定了“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三大改造”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意义,改革的是“三大改造”的不足之处,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对当年简单、粗糙的做法的完善、补充,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和提倡民营企业的发展,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引进利用外资,在分配方式上,允许资本按要素参与分配。这些措施是在肯定“三大改造”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目的不是要回到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是为了更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是继承和改革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前进发展。如果认为改革是为了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这是历史的倒退。

四、历史的启示

我们认为,中国通过和平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又一个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改造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同时也通过中国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发生变化。这里的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能够“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的具体结论、具体规定(包括设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或基本精神,无疑是后者。而“中国”是不同时代不同国情且具有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点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

基本原理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在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从国情出发找到了一条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路。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有明确指示,俄国革命也有成功的实践经验,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对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设想、一个结论。十月革命也只是在俄国的国情条件下最初成功的一种经验。简单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另辟蹊径,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情条件下做出的创造性选择,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马列书本中的革命具体观点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不是具体结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成功的和平的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给人们一个启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实质。但怎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怎么从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途径、多条道路。通过暴力革命,这是一条道路,也可以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通过和平改造的道路,用非暴力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可以肯定,在不同时代、不同国情条件下,聪明的人们还会发现别的什么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既要反对那种教条式的思维方式,固守书本的某个结论,也要反对那种经验式的思维方式,照搬某种成功的经验,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坚持从时代和国情的实际出发,找到一条最顺利最有效的通达社会主义的新路。当代中国共产党还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选择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后,又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历史的前沿。

注:

- ①刘林元、张明《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版,第116页。

-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 ⑤刘林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深刻教训——兼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历史价值》,《湘潭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金宁)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 New Non-violent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Road

Liu Linyuan

Abstract: On the question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arxism classic writers insist that it should be carried forward by the way of violent revolution, Russia experiences has proved it. CCP,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did not blindly copy the Marxist doctrines and Russia experiences, instead of combining Marxism principle with Chinese social reality and finding out a new non-violent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road, it has realized the leap over classical Marxist theory. Under the present historical condition, reliving the new historical road of Chines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Chines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arxism; non-violence revolution; new democracy